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27冊

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

黃錦樹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黃錦樹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序 2+ 目 2+19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27 冊）

ISBN：978-986-322-037-4（精裝）

1. 章炳麟 2. 學術思想 3. 經學

030.8

101015393

ISBN-978-986-322-037-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322-037-4

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

作 者 黃錦樹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

黃錦樹 著

作者簡介

黃錦樹，一九六七年於馬來西亞柔佛州，一九八七年到台灣留學。台大中文系畢業，淡江中文所碩士，清華大學中文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著有碩士論文《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譜系》（1994）、博士論文《近代國學的起源》（1998）、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1998）、《謊言與真理的技藝》（麥田，2003）、《文與魂與體》（麥田，2006）、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九歌，1994）、《由島至島》（麥田，2001）等。

提 要

本論文以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為對象，做一番類思想史的分析。論文嘗試同時聚焦於「有學問的革命家」的激進與保守的雙重性，但最主要的還是試圖對「樸學」、「小學」做一番學術精神譜系的「精神分析」。希望藉由章太炎這一極為獨特的近代個案去瞭解或嚴時代台灣國學隱秘的精神身世。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對研究目的、方法、論題等做約略的說明。第二章「乾嘉樸學的知識場景」嘗試一探乾嘉樸學的精神狀態，尤其關注古韻學突破的精神史意義、樸學表述形式的精神特性。第三章「（實踐）主體與「大體」的復歸」從章太炎的個人思想史去處理憂患與文字、小學與寫作的關係。第四章「言文合一：語言本體與文字表徵」嘗試全面的探討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幾個不同面向，勾勒出其理論的結構，回到文字學史、漢字史的源初、探勘字與象的歷史關聯與理論關聯，並解釋他的偏執與焦慮、他視域之外的非思之地的意義等等。第五章「在佛莊會通的場域」處理章太炎〈齊物論釋〉這一章氏個人思想史上的「認識論的褶痕」。第六章「遊於『物之初』」探討章太炎的文學論，他的文學復古論、文學退化史論及極其特殊的白話文論等。第七章「總結：革命、光復、學隱」對全文做總結，兼對碩論口委的提問做答覆。

自序

這本碩士論文完成於一九九四年，寫於淡水。那年暑假論文修訂完成後，我曾寫了篇長序，感謝一些師友，卻不無憤懣之意，因為經歷了一趟非常不友善的口試。

十八年過去了，多年來我對這本論文沒甚麼興趣，懶得重看，也從沒想過要出版。「自藏本」跟著我搬遷多次，書背上的印刷字有的都掉了。

這四五年來花木蘭出版社每年都給我寄博碩士論文出版的同意書，每年寄每年丟，丟到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只好寄出「自藏本」。但收到一校稿時又後悔了，更何況出版社給的時間又要命的短。

這幾天硬著頭皮重看，覺得有的部分還真不錯——縱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還蠻有想像力的，也挺能「作文」。尤其第二章和第四章，特別有趣味。

初稿及修訂稿第四章均遺漏了從 26 至 31 這六個註，幸好手稿還沒有丟掉，特檢出補上。當年口試也沒有人注意到這疏失。

因為畢竟是近 20 年前的習作，這次出版便沒做甚麼修改（除非是明顯的錯誤），好些轉引的資料也沒有還原，以見證彼時讀書的限制。而〈提要〉却是新寫的。

校對這本書勾起我留學淡水三年的許多回憶。還是得感謝當年的諸多師友、同學，昔年的女友而今的妻；與及時在中學大學植病所就讀的胞兄，大部分的文稿都是他用研究室的電腦幫我逐字打出來的。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理解·門檻·章太炎	1
一、(不)被理解的章太炎	1
二、關鍵詞 I：「語言文字之學」	4
三、問題設定：「識字」	7
四、方法、章次。關鍵詞 II：知識、精神	10
五、關鍵詞 III：系譜／譜系	13
六、研究目的	15
第二章 乾嘉樸學的知識場景	17
一、沉重的開場	17
二、「經世」的萎縮和「經」的懸擱	21
三、一種以古音為中心的論述型構之形成	23
四、書的還原式重構	38
五、認識論上的憂鬱	42
六、操作上的復古主義	43
第三章 (實踐)主體和「大體」的復歸	45
一、在樸學的邊緣處	45
二、實踐主體的復歸：文化身份與象徵行為	49
三、集體記憶的結構	67
四、「大體」的復歸	73
第四章 言文合一：語言本體與文字表徵	79
一、結構與邊緣	79

二、「識字」的兩種問題情境	80
三、方言：古遠的舊音遺響	83
四、作為本體的「一」	89
五、太初有道：語言起源與初始的感性	93
六、初造書契：原初的凝視和足跡	100
七、增補：象的生產性與六書	104
八、《文始》：言始著跡，表徵為文	112
九、方言（白話）：大地的話語	121
十、出土：被否定的掩埋	125
十一、「古文」的憂鬱	128
十二、出土的存有	134
第五章 在佛莊會通的場域	139
一、在起點和終點處	139
二、隱匿的前提：齊文野	141
三、（遺破）訓釋	143
四、建構俗諦	147
五、有／有始／有封	150
六、石頭問題	153
七、「兩行」辯術	155
第六章 遊於「物之初」	159
一、「文學」場域	159
二、「文始狀態」	160
三、「汰華辭」	162
四、「復歸於樸」	163
五、「古怪」	166
六、「守凡例」	170
七、語詞的遭遇	171
八、「書寫」	173
九、故鄉	174
第七章 總結：革命·光復·學隱	175
一、章次關聯	175
二、革命的復古論	178
三、啓蒙的辯證	180
四、「學隱」、文化主義與種族主義	181
五、最後的……	184
引用及參考書目舉要	187

第一章 緒論：理解·門檻·章太炎

一、(不)被理解的章太炎

章太炎在近代被稱為「國學大師」，〔註1〕以他在學術上涉及面之廣、之深，也確乎當之無愧。然而章太炎之所以異於他人又在於他是一個激進的反滿先鋒，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清革命元老。兩個形象的結合，便是魯迅給他的蓋棺論定：「有學問的革命家」。〔註2〕章太炎的學術和生命張力，部份便藏蘊於這兩個形象蘊含的內在矛盾之中。

也就因為章太炎在學術上涉及面廣，對當時的政治又勤於發言勇於參與，就給了不同立場的研究者「各取所需」的便利，在各個不同的理論立場上、或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給章太炎下他們需要的「定論」。而對章太炎的論斷，最常見的思考格局是傳統／反傳統，〔註3〕這當然頗切合章太炎的時代處境；而相關的研究，在成為主流論述之後，也業已成為理解章太炎的基本前提。然而在台灣中文學界，自西元1949年以來章太炎就飽受冷落，研究者鮮矣寡矣，即使是在國立師範大學，他晚年在「章氏國學講習會」收的一些弟

〔註1〕許壽裳，《章炳麟》（收入存萃學社編，《章炳麟傳記彙編》，大東圖書公司，1978）。

〔註2〕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6），谷風，1989）。

〔註3〕如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時報，1985年；汪榮祖，《康章合論》，聯經，1988；湯志鈞，《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商務，1990；龔鵬程，〈傳統與反傳統——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收於氏著《傳統·現代·未來——五四後文化的省思》，金楓，1989）其中湯志鈞堪稱章太炎專家，因為他寫得最多，惟觀點也最陳舊。此一思考局堪稱章太炎研究的主流。

子也並沒能指導出一些關於章太炎的、有規模的學位論文，〔註4〕即使是曾親炙於他的入室弟子，對章太炎學術的闡發也極為有限，使得章太炎的形象輕易的被窄化為一個皓首窮經的「小學」研究者。而章太炎在台灣之所以受到那麼冷淡的對待，也許是潛在的政治因素使然。章太炎作為一個否定的思想家及永遠的反對者，那種衝決網羅、見佛殺佛的衝勁是戒嚴體制、權威統治最忌諱的，中文系作為國民黨大中華沙文主義的意識型態共謀者，或者乾脆以忽略來讓他沈默，或者把他的形象漂白闖割，讓死後的他「安心講學，勿涉政治」。〔註5〕況且章太炎生前即曾和孫中山交惡，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永不止歇的批判者；〔註6〕章太炎對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政策」也毫不客氣的公開抨擊過。〔註7〕而在偏安局面下國民黨重新建構起來的「中華民國史」中，為了保持政統傳承譜系的血緣純淨度，章太炎這個給「中華民國」命名的「父親」〔註8〕和許許多多其他革命元老一樣，注定被省略、被出局、被遺忘。另一個可能原因是，章太炎的學術成就相對而言，其實是建立在總結上而非開創上。〔註9〕

套句章太炎常引述的戴東原的話「大國手門下，不能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反能出大國手。」章氏解釋說：

蓋前者倚師以為牆壁，後者勤於自求故也。〔註10〕

在《國學概論》中，他以惠棟和戴東原為例，解釋何以學問不如惠棟的戴東原，門下竟然出了幾位「大國手」。最主要的原因是：惠棟「墨守漢人師說，

〔註4〕 揭至西元1990年為止章門弟子只指導出一本學位論文，即袁乃瑛，《餘杭章氏之經學》（《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6）》1962年）。

〔註5〕 西元1933年在章太炎公然批評蔣介石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批評國民黨「勇於私鬥，怯於公戰」之後，章太炎的拜把弟張繼（時任國民黨政府華北辦事處主任）卻托李根源傳達蔣的旨意，要求他「安心講學，勿議時事」。詳王有為《章太炎傳》，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180。

〔註6〕 參許壽裳，〈國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收於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註7〕 詳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1919~1936年）》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929~934。

〔註8〕 章太炎撰有〈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為中華民國命名。以現在的目光來看，「國父」應不只一人，而是一群人。現有的「國父」也無非是一項某種政治需要之下的政治建構。

〔註9〕 這部份決定於他的弟子是否有能力「開發」他留下來的資源，開創與總結並非截然對立。又詳第六章第一節。

〔註10〕 章太炎，〈葯漢閒話〉，《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7。

不能讓學者自由探求，留發展餘地」，而戴震「從音韻上闢出新途徑，發明『以聲音合文字，以文字考訓詁』的法則」，二者「手段已有高下。」〔註11〕這段耐人尋味的話相當辯證的同時褒貶了惠戴，也同時點出了身為「大國手」的章太炎在傳承上的困窘。他的一些傳統學術領域內的代表性著作，無一不是「總結性」的；把清儒的研究方法貫徹到極致（如《文始》、《新方言》），把「以佛解莊」的研究路向推到極端（《齊物論釋》），卻也由於他涉及的學術領域太多，一如《國學概論》體例上的無所不包卻又前有所承，難免易於被穿透者遺忘。之所以如此，責不在章太炎，那是時代的尷尬：中國（文化）正處於千古未有之變局，在政經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急驟變遷之下，不斷湧進的新思潮會讓曾經熱切汲取西學的章太炎在相形之下「自然」顯得保守，而他的弟子門生，普遍上又魄力不足。再者，章太炎的學術論域是一個複雜異質的整體，而他又站在經學「終結」〔註12〕的臨界點上在他的生命裏，經、史、小學、哲學……不分。而他死後，「道術為天下裂」，西式的學院分科統馭了新一代的知識結構。章太炎的許多學術創見也被不具名的援引剽竊，輾轉引述抄襲之後，不止祖祧難明，更糟的還淪降為普通常識。〔註13〕

中國大陸的章太炎研究，深度和格局始終沒有超出侯外廬氏《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中的章太炎論述。投入的人力原本就不多（相對於《魯迅研究》、《文心雕龍研究》、《郭沫若研究》之類有期刊支撐的），更加上以教條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教條哲學為學術研究的最高指導原則，所有學術問題都被化約為認識論（唯心／唯物——是非題）、傾向性—階級成份（「章太炎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註14〕於是死後的章太炎就一直被政治凌遲。不論是姜義華、

〔註11〕 章太炎，《國學概論》，河洛，1974：43～44。

〔註12〕 「經學終結」是大陸近代經學史研究者常見的提法（如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1989，最後一章即題為〈經學的終結〉），而國內的經學（小學？）研究者卻始終無法接受。這種提法是相當有意義的：經學（不論今古文）產於帝制大一統確立之後（秦、漢），在長期和帝制政權的依附中，二者實已唇齒相依：政權給予它文化、典籍權威的無上地位（所以在目錄學中經學典籍永遠列在首位）；而它提供一套完整的象徵符碼來證成政治權威。帝制的終結之後經學的地位也隨之直線下墜，聖典《春秋》被譏為斷爛朝報，寶典《說文解字》淪為不完善的辭典。如此，「經學」業已從「經世致用」之業降為抱殘守缺之務。

〔註13〕 章太炎的諸子學研究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胡適等人明引暗襲，幾番「稀釋」之後，早已成了普通常識，而忘卻了起源。

〔註14〕 中國大陸1961～1980年間的章太炎研究都充斥著這種腔調。參章念馳編，〈章

湯志鈞、唐文權、羅福惠、李潤蒼，無不以政治傾向為論述前提。〔註15〕而對於章太炎晚年的論斷，論者都異口同聲的拾魯迅的餘唾——在魯迅的章太炎論述裏，在價值上章太炎是革命與學術斷為兩橛的；章太炎既是可敬的革命先鋒，又是落伍的國學大師；晚年更「既離民眾，漸入頹唐」。〔註16〕魯迅這種論斷，在不斷的否定之中，暴露的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然而他那種忘乎所以的入世姿態，恰又被看做是革命的章太炎的精神延續。〔註17〕於是魯迅畢生刀筆事業最終的未竟之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竟還是反芻著他早年印象中革命啓蒙者章太炎的身影，文末的空白，確是充滿著象徵意味。〔註18〕

章太炎的困難和誘人之處也許正在於他思想的駁雜性；他的涉獵太廣，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典籍他漫無邊際的碰觸之外，其時透過中、日文翻譯的歐陸哲學、自然科學、印度哲學……他也普遍接觸，以致學術資源來源複雜，而他又偏好艱難的表達方式，是以不易親近，更不容易理解。兼之他又活動在一個古老中國從下層建築到上層建築都激烈震動的大時代，一個難以理解的歷史轉折期。難以理解的時代中的一個難以理解的人，就某方面而言，卻是一個古老文化的象徵，他的身世是那個時化一幅色調強烈的側影，一則引詭的寓言，他的著述串成了一部多雜質的《國學概論》。

二、關鍵詞 I：「語言文字之學」

大陸和台灣對章太炎的共同冷落都有著難以忽略的政治因素，而冷落的結果則是讓章太炎就某方面而言仍然是個謎。尤其在「小學」細分為文字、聲韻、訓詁之後，以小學為學問入手處與學術根柢的章太炎就愈發難以瞭解

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二），載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九期。〔註15〕姜義華的《章太炎》（東大，1991年）算是箇中較平實的一本，因為教條前提比較隱匿。湯志鈞也難逃此窠臼。唐、羅合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1986年），羅列式的全面，教條氣味相當濃。李潤蒼的《論章太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亦然。李澤厚的〈章太炎剖析〉（收於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三聯書店，1988年）也不例外。

〔註16〕魯迅，同註2引文。

〔註17〕島田虔次，〈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收於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

〔註18〕魯迅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6）》，谷風，1989年：551～554）是他生平的後最後一篇文章，至臨終尚未完稿。是文頗慨嘆太炎文集不收早年鋒銳的論戰文字，便宜了小人（吳稚暉），而「貽患千古」。至死無悔的戰將魯迅，在回憶的末尾留下一片懸疑的空白。

了。而通常討論「章太炎（哲學）思想」的學者，章太炎的「小學」論著若非三兩筆帶過去，就是有意無意的忽略；把《文始》、《新方言》擺入「訓詁學」範疇內討論的著作，又總是把它從章太炎的思想體系和生命史中抽離。〔註19〕把它客觀化的同時卻也讓她失去了原有的豐富性和生命力。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而凸顯「小學」在章太炎思想／學術中的意義的，一是侯外廬，一是傅樂詩（Charlotte Furth）。

在進入侯、傅二人的論點之前，得先解釋一下本論文標題中的第一個關鍵詞：「語言文字之學」。為何選擇此一特殊的措辭？它和「小學」之間有著甚麼樣的關連和差異？對章太炎而言又具有怎麼樣的象徵意義？

章太炎於光緒 32 年年初在《國粹學報》第 24、25 期上發表了一篇〈論語言文字之學〉，在中國「國學」的視域內首度為這一門近代化中的學術命名。〔註20〕命名實為正名。在該文中他道出了這措辭的意涵、它和傳統「小學」之間的關係等等。且讓原文自我表述：

今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蓋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識字。……故以「小學」為名。〔註21〕

接著談到了「小學」的內容，舉了一些必讀經典：《說文解字》、《爾雅》、《方言》……《廣韻》等等文字、音韻、訓詁的代表作，而總結說：

合此三種，乃成語言文字之學。

說明了小學和語言文字之學的範圍是一致的。他接著解釋了何以要「正名」（易名），換言之，也就是道出二者的差異：「此固非兒童占畢所能盡著。」（道出了「名」早已離「實」）「然猶名為『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

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搞切。此種學問，漢《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誦經而已。周秦諸子，《史記》《漢書》之屬，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學者，必不能讀。若欲專求文學，更非小學不可。漢時相如子雲唐時韓柳，皆通小學，故其文字闔深淵雅，迥非後人所及。中

〔註19〕學科的分割造成這種狀況，特定的學科之成立，正是以大量的排除為前提。排除是一種遺忘，忘卻了它們原屬於某個整體。排除也是一種簡單化，因為在那分割線上存在著的常常是被遮蔽的豐富性。

〔註20〕姜義華，《章太炎》：「事實證明，語言文字作為一門獨立的近代科學，在中國是由章太炎最初奠定的。」1991年：63。

〔註21〕頁碼依大漢出版社的影印本（1972年）頁2971。

間東漢六朝，諸文學家亦無不通小學者，一披文選，便可略知梗概。外自中唐以後，小學漸衰，韓退之言：「凡作文字，宜略識字。」可知當日文人已多不識字者。自宋以來，歐曾王蘇諸家，皆於此事茫然不省。……要之文辭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識字而能為文者。……吾生幾四十歲，所見能文之士，大抵未能識字。（頁 2971~2973）

這段文字非常重要，談到了小學在傳統學術領域內的重要性：既為經學的附屬又不止於此。更有感而發的談到小學訓練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及其在歷史中「淪落」的歷史，而提出了一個大問題：「識字」的問題。他也論及小學對當代的重要性——做為翻譯的基礎。而下了一個很重的結論：

……小學者，非專為通經之學，而為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頁 2973~2974）

於是「小學」的地位便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傅樂詩敏銳的指出章太炎把「小學」看做是國學的「基礎科學」，〔註 22〕既是不得不然的基礎訓練，也是一道古舊堅硬的門檻。「小學」在章太炎學術中的關鍵地位，也已是不言而喻。

回到〈論語言文之學〉。在下完結論之後，章太炎似乎已忘記了「語言文字之學」此一措辭，而回頭介紹「小學」中的各個領域（形體、音聲、訓詁）之內容（古韻分部、六書說……）。如此，問題就出現了。

他並沒有一如期待的指出「語言文字之學」和「小學」的差異，只在前頭暗示——「正名」似乎是為了讓這門學術脫離經學附庸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層涵意指出之後馬上隱沒入「小學」的不斷前景化之中。更妙的是，此文不見於章太炎自己結集的著作裏，在章太炎往後的著作中，也不見再用「語言文字之學」之名。此文分兩期刊載，上下篇其實論述內涵大不同，上修改增補後易名為〈小學略說〉收入《國故論衡》；下篇修改易名為〈語言緣起說〉〔註 23〕也收入同書，借勝論「格」經學上的語言緣起。換言之，「語言文字之學」此一措辭章太炎後來放棄了。而「語言文字之學」其實通向受歐美實證主義語言學影響而成為獨立學科的「中國語言學」，其研究範圍和「小學」差不多，而精神卻大異其趣。它其實象徵了經學終結之後，在精神上和

〔註 22〕 傅樂詩，〈獨行孤見的哲人〉，收於傅樂詩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時報，1985年：115~116。

〔註 23〕 湯志鈞在〈章太炎著作繫年〉中提到了這一點，然而他只提到「下篇」的修改，全然不提「上篇」的下落。湯志鈞文收於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文選》，頁 381。

經學唇齒相依的「小學」也隨之萎頓，「小學」內隱含的神祕色彩也被逐漸洗淨。這被章太炎刪除卻留下來的不可磨滅的痕跡，恰足以做為章太炎知識／精神處境的一個隱喻：他把腳踩在時代的分界線——門檻——上。（註24）

三、問題設定：「識字」

身為古文經學最後的大師，他佇立在經學「終結」的臨界點上——帝制的瓦解，使得經學失去了它在政治上的可見形式，可是做為一種論述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註25）它卻早已深入中國文化的內在，為諸多可見的領域提供不可見的形式，難以追溯起源的隱匿之流。（註26）換言之，經學的不可見形式仍舊完好的存活著，並且為中國文化的整個象徵系統提供深層架構，為所有的理解提供前理解的條件（註27）於是章太炎之站在「小學」和「語

〔註24〕汪榮祖在〈章太炎的中國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中認為章太炎把中國語言學帶離經學／小學，而讓它「近代化」；且認為章太炎並不反對白話文。（氏著，《章太炎研究》，李敖出版社，1991年）為賢者諱或為賢者辨誣用心誠然可貴，不過那些說法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詳本論文第四章。

〔註25〕借自傅柯的修辭。詳參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麥田，1993年）箇中的關鍵詞 discourse 或譯「言說」（採自佛家名相）、「話語」、「論述」……均偏重於語言，而忽略了此一型構經常是作用於非語語的層面上，是各個學科、領域、範疇共同遵守的內在假定，決定了「何以如此運作」的機制。它的可見形式是權力關係。

〔註26〕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卻仍然很少人致力的重要課題。蔣年豐的〈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清華學報》，新二十二卷第一期，1992）直接針對此一問題來談，立意頗佳，而不知道甚麼緣故一除了一些西方的大名詞之外，全部依賴盲從近代人（徐復觀等）的二手詮釋，似乎連《春秋》經傳正文也進不去：一些西方大名詞（如「原始語言」）在運用上內涵也交待不清，以致近乎「望文生訓」。結果使得此一「行政院國科會補助之專題計劃『儒家經學的解釋學基礎』的成果之一」淪為偷工減料的玩笑。此一論題牽涉極廣，倒是「從文學批評出發」的龔鵬程先生做了一些可喜的嘗試。詳〈論詩史〉（氏著《詩史本色與妙語》，學生書局，1986），在該文中他注意到「清代常州今文派的詮釋系統不是特指的，而是廣涵的，舉凡一切經史小學詩文詞賦，都涵蓋在這個解釋系統之下。」（頁71）這便是蔣年豐呼之不出來的「經傳的解釋學基礎」。另外在〈細部批評導論〉一文中，龔先生也指出了細部批評（如：評點）在模式上和解經的體例是可以互通的，《春秋》書法和文章的法則有結構上的雷同。（收於氏著《文學批評的視野》，大安出版社，1990）。

〔註27〕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受傳統和語言的制約：「『前理解』給了解釋者理解作品的的能力，同時也限定了他能理解作品的範圍。」殷鼎，《理解的命運》，東大1990年：65。有關前理解的各種問題，本書有簡要的分梳。

言文字之學」的臨界點上，在那小學和經學仍然相互依存、語言文字之學尚未分化為近代的西方的（科學？實證）語言學之際，該論述型構的豐富性尚未遭受割裂，它作用在章太炎身上而呈顯出來的文化癥狀恰恰可以讓我們窺見經學在由可見形式全然轉向不可見形式之際的若干殘餘形跡。

在討論上，相對於已然分化的語言文字之學（已分化為「聲韻」、「訓詁」、「文字」三大學科，甚至許多小學科也已獨立出去），〔註 28〕本文的立場是準備開倒車，回到學科尚未分化、正在分化之際；對於傳統「小學」而言，本文的立場則是把原有的問題設定（problematic）轉移，〔註 29〕關注的是此一特殊的論述型構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構成一封閉的文化網路，……最簡單的說，則是「識字何以成了問題」。在該論述型構中，這是一個進入中國文化之門的最基本要求，但也是最困難、最終極的問題。因此它所涉及的相關問題，是難以想像的糾結與複雜。在這裏，可以再度與侯、傅二氏相會。

侯外廬氏相當敏銳的看出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學除了繼承清代樸學家法之外，又結合了荀墨名學、西方形式邏輯，而與他的經史之學結合〔註 30〕而傅樂詩則更進一步指出：

在清之學術界裏，小學不安於僅是狹隘的技術性學問，而要求享有一種基礎科學的地位，係了解歷史、哲學與政治一切層面的需要的根本方法。在大師戴震及章氏本人手中，小學幾乎成為研究所有哲學與文化所採取的一種語言學的方法。章氏對其他中國學術的評斷，首先是以其對古典的語言學代表意理（truth and meaning）之基本議題。〔註 31〕

〔註 28〕 如：聲韻學之依時代、材料（方言、韻書）而細分，文字學亦然一分為古文字學、俗字……依需要可以不斷細分。

〔註 29〕 襲自巴歇拉爾（Gaston Bachelard）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對於「問題設定」的理解：它是理論的問題結構，即是對某一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提出所必然採取的形式的絕對規定（頁 46~47），而每一個學科、每一種理論對只能在特定的問題設定內思考和運作。所以問題設定本身是排他性的，不可見的和不能解決的都被排除在外。然而在排除的過程中，許多矛盾會以空白、缺失、筆誤等等痕跡的方式做為結構性的症兆而呈現，所以阿圖塞又強調「對症解讀法」（Symptomatic reading）（頁 47），詳柯林尼可斯著，杜章智譯《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遠流，1990 年）本文的「轉移」意即從「小學」原有的問題設定中擺盪出去，在幾個學科的邊界遊走。

〔註 30〕 侯外廬，〈章太炎的科學成就及其對於公羊學派的批判〉（收於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頁 125~131。

〔註 31〕 同註 22 引文。

傅樂詩的洞察相當可觀。循著她的思路，可以進一步窺探章太炎和清代樸學在研究方法上，思路上的內在聯繫，甚至進而探掘章太炎所屬的「古文經學派」究竟是在一個怎樣的典範（pradigm）、世界觀、理論預設之下從事學術研究。甚至可以問：

清代在音韻學上取得突破之後，對於傳統文字學／訓詁理論究竟進行了怎樣的改造？這些改造的思想史、學術史意義何在？而循著侯外廬的提示，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其實和他的哲學密不可分。不止關連著他的經史之學，且還關乎章太炎的文學觀、世界觀而和整個章太炎的思想體系密切關連。

結合上述二者，章太炎的「小學」論著於焉便可以理解為是某種語言哲學論著，或是某種語言哲學實踐下的產物。而在章太炎手上，經史尚未分家，經學也尚未被宣告死亡；於是在討論上勢必要把問題擺在經學的論域裏；在訓詁學上被視為瑕疵的，在思想上未必無意義——同理，章太炎之始終反對吉金甲文、白話文等等，也可以獲得結構上的解釋。

另外，章太炎研究無可避免的必須觸他早／晚年思想轉變的問題，前述論者反傳統／傳統、激進／頹唐的評斷或多或少也是受到章太炎自我論斷的提示。他在〈葑漢微言〉中反省自己接受唯識法相時，說道那是因為法相唯識「從入之涂與平生樸學相似」「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遺名相終」；〔註 32〕而談及個人的學術思想史時，又說：

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註 33〕

前一組文字明顯的關涉章太炎的語言哲學，尤其牽涉「樸學」的語言學方法和法相語言哲學的相同與差異。一般研究者常輕輕略過，而沒有更細緻的考察章太炎「從入之涂與平生樸學相似」，這句話究竟說出了甚麼，與及更重要的，沒說出的又是甚麼？因為很顯然的，在「分析」和「排遺」之間其實存在著極大的跳躍，並不是單純的方法論問題。甚至牽涉到是否產生了認識論的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註 34〕關連著章太炎中後期（以《齊物論釋》

〔註 32〕 章太炎，《章氏叢書》，世界書局，1982：960。

〔註 33〕 《章氏叢書》，頁 961。

〔註 34〕 「認識論的斷裂」是巴歇拉爾提出的觀念。巴歇拉爾主張「在一門科學發展過程中，認識的發展達到一個限度就中止了知識的繼續累積，中斷了認識的緩慢發展，迫使它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與它的經驗來源和原動力割斷了關係，把這些經驗來源和原動力從它的聯繫中清洗出去。」（引文據尹太貽譯，伊·庫茲韋爾著，《結構主義時代》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30）原文出自傅柯的《知識考古學》的〈緒論〉，前引王德威譯書此段文字在頁 70。又